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教授

“独立性”这面旗帜，美高校还能打多久

■郭英剑

在本专栏2月11日的文章《特朗普“兴师问罪”，美教育部命运“凶多吉少”》中，我着重探讨了特朗普二度执政，为何将矛头指向教育部，并且公开威胁要裁撤联邦教育部的缘由。事实上，特朗普的矛头不但直指教育管理部门，更对美国高校系统提出了诸多尖锐批评，焦点则集中在入学成本、学术自由和意识形态倾向等方面。

特朗普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已经脱离了其本应承载的社会责任，成为一个充斥着“左翼意识形态”的阵地。他还认为美国大学高昂的学费让大量学生深陷债务陷阱，削弱了大学教育的公平性。他主张减少联邦政府对教育机构的资金支持，推动更多私营企业参与其中，增加竞争，从而降低学费并提高教育质量。

特朗普还强调，大学需要更注重技能教育和为实际工作所做的准备，而非单纯的学术研究或理论教学。他主张加强职业教育，并鼓励更多学生选择与就业市场紧密相关的学科。

那么，特朗普对美国高校教育究竟有何批评？高校到底是如何应对的？特朗普的政策将把美国高等教育引向何方？

不同高校的不同回应

针对特朗普的批评，美国高校的回应大体可分为三类。

部分大学校长选择了进行自我改革，尤其是在取消“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DEI)项目方面，作出了较大调整。

DEI项目起源于美国的“平权行动”。DEI是三个英文单词Diversity(多样性)、Equity(公平性)与Inclusion(包容性)首字母所组成的一个组织框架的简称。该框架旨在促进“所有人的公平待遇和充分参与”。这3个字母也代表着三种紧密相连的价值观。

特朗普在其首个任期内就曾力推取消大学中的DEI相关项目，认为这些项目助长了大学中意识形态的单一化，且过度关注种族和性别议题，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多元性，但可以说以失败告终。

此次特朗普在4年后卷土重来，又一次将批评的矛头直指DEI项目。这一次，部分大学校长和教育界领袖选择响应批评，并开始调整其学校的政策，尤其是针对DEI项目的修订和调整。他们将重新审视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项目，减少对种族和性别的过度关注，转而更多关注学术成就和个人发展。也有不少高校将大幅度削减其DEI办公室的预算，并重新审视大学课程设置中是否有过度倾向的意识形态内容。

同时，部分高校领导人选择公开反对特朗普的严厉批评。比如，美国卫斯理大学校长迈克尔·罗斯和美国华盛顿圣三一大学校长帕特里夏·麦奎尔就对特朗普的攻击表示震惊。

罗斯在文章中呼吁，大学校长在看到自己机构的使命和校园社区的健康“受到损害

美国高校的独立性是其教育体系的核心特征之一。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施压正在改变这一传统。



时”应该进行权衡。他还在美国教育委员会会议上指出，自己尽量“不直接谈论总统”，但在机构价值观受到外部势力威胁时，要站出来予以维护。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校长埃里克·卡勒在致校园的一封信中写到，这种将校园生活方方面面都包括在内的做法，似乎超越了最高法院的裁决，可能会受到法律制度的挑战。他补充说，大学“将继续坚定地致力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除了响应者和批评者外，大部分美国高校校长则选择保持沉默或避免公开表态，其背后的原因大致可归纳如下。

首先，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和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学校长担心公开回应可能会引发政治争议，甚至危及学校的资金和声誉。要知道，很多大学都依赖于联邦资金和州政府的支持，这使得这些大学会更谨慎地处理政治议题。因为他们知道，公开站队可能会影响到政府拨款、校内外的支持及校友捐赠等关键因素。

其次，大多数大学校长认识到，美国高等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极为多元化的系统。特朗普的批评被视为是对这一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挑战，因此，许多校长认为保持沉默是尊重这种多元化的体现。比如，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拉里·巴科就在一次讲话中表示，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是保持学术自由和思想的开放，而非迎合单一的政治声音。

再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机构，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保障学术自由和教育质量。许多美国高教界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批评如果过于偏激，自然会影响教育的独立性和创新性。对于一些知名大学的校长来说，保持沉默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避免与政治斗争产生过多的联系。

最后，学生群体的多样性需求。很多大学都有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其文化背景和社会观点各不相同。很多校长认为一旦公开站队，就可能会造成校园内的对立和不和谐。

大部分高校的沉默不语引发了业内外人士的广泛批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公开发表声明，对高校的中立立场持批评态度，认为这

掩盖了诸多事实。美国教育学者琼·斯科特批评高校校长面对特朗普政府的攻击时选择沉默。她表示，校长们正在采取一种平衡行为，这是一种懦弱的行为。

在她看来，与长期风险相比，许多人更关心“短期风险”，比如增加捐赠税或失去联邦资助，而不是“在特朗普四年任期的剩余时间内，我们所熟知的高等教育将消失或被搁置”的“长期风险”。

美高校独立性由来已久

我们知道，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其高校相对“独立”。这种独立性不仅涉及学术自由、研究方向、课程设置等方面，还深深植根于美国历史和文化中的教育理念。

首先，美国的宪法中并未明确规定联邦政府对教育的直接干预，这使得各州在教育事务上享有更多自主权，而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干预则相对较少。因此，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更依赖于州政府和大学自身的自主决策，而非中央集权指令。

其次，美国高等教育长期秉持“学术自由”的核心价值观。在这种理念下，高校具有相对独立的管理结构、课程设置和研究方向。这种相对“自治”也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以及管理层选拔、校际关系安排等方面。大学校长和教授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较大的决策权，尤其是在学术问题上。

再次，尽管美国高校享有较高的独立性，但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依然是许多大学运作的重要来源。美国政府通过拨款、发放奖学金、提供科研资助等方式支持高校发展。特别是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医学等科技领域的进步，政府资助逐渐增多，并成为高校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不过，政府的资金投入更多的是“支持”，而非对学校的直接控制。大学在学术研究、课程设置等方面依然保持较大自主权。

最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非常多元化，从公立大学到私立大学、从研究型院校到应用型院校，各类学校的教育目标和运作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这使得不同类型高校在一定

程度上形成了自主的管理模式和教育方向。大学间的竞争、学术机构的自我调节机制也促进了教育质量和理念的不断创新和调整，进一步巩固了高校的独立性。

高校整体生态可能改变

特朗普此番重入白宫后，采取了更直接的施压手段，导致美国高校的独立性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联邦政府在资金分配、政策要求等方面的施压，可能会深刻改变美国高校的整体生态。

特朗普政府曾多次将联邦资助与高校在某些议题上的立场挂钩。例如，他要求高校削减其DEI项目，或强烈反对学校支持的抗议活动。如果高校不遵守这些要求，可能面临资金削减或政策制约。换言之，特朗普就是通过控制资金流向，迫使高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其课程设置、校内文化，甚至学术研究方向。联邦政府资金长期是大学的重要资源，而特朗普将其作为施压工具，改变了教育资金与学术自由之间的微妙平衡。

作为特朗普施压的一个直接后果，许多大学可能会感受到来自政府的审查压力，导致一些大学在处理学术事务时更加谨慎，以免与联邦政府的政策产生冲突。比如，在一些敏感话题上，大学可能会减少相关课程的开设，或在学术研究中采取更加保守的立场，以适应政府要求。这可能使大学学术讨论更趋保守，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美国大学的创新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氛围，甚至导致学术界的“自我审查”。

此外，特朗普的施压还可能导致美国大学政治化进一步加剧。大学在面对联邦政府资金的压力时，可能不得不在某些政治议题上表态或采取行动，这又可能在校园内引发更加强烈的政治对立。大学原本是相对中立的学术场所，但此时却面临维护其教育自主权的压力，又必须遵循政府规定的合规要求。这就导致许多大学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维持学术自由和多样性是大学的核心价值；另一方面，联邦政府的资金支持对许多高校至关重要。因此，部分大学可能在不公开表态的情况下作出妥协，适度调整自身政策，以避免资金流失。

而由于美国各州对教育的监管有差异，特朗普的施压可能在不同地区高校中产生不同的效果。例如，在某些较保守的州，大学可能更容易接受特朗普的政策调整，甚至主动推动相关改革，而在某些较为自由和多元的州，大学可能会采取反对态度。这种地区性差异可能导致美国高等教育生态进一步分裂，甚至出现不同高校间的对立和矛盾。

如前所述，美国高校的独立性是其教育体系的核心特征之一。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施压正在改变这一传统。在这背后则是对高等教育生态深刻的挑战，它可能导致学术界的保守化、思想单一化，甚至政治化，进而影响美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力和自由精神。

中国大学评论



樊秀娟

同济大学
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目前，相比于理科生，国内文科生的就业困难现象更为普遍。一些自媒体和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机构也趁机大肆炒作，通过贩卖焦虑达到获得流量或营销的目的。在笔者看来，时下各种对文科教育价值的非理性贬损，以及对文科专业学习的盲目舍弃或否定，既使当下文科生的就业困境“雪上加霜”，更对国家和民族未来贻害无穷。

文科生就业难是当下国人科学信仰和职业道德欠缺在文科教育上的集中体现。说得具体点，因为文科教育相比理工科教育来得“软”，不少学校、学生和用人单位等对文科教育“大放水”，导致文科教育质量全面下降，文科生的就业竞争力薄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高校人才培养角度看，我国几次高校扩招的重心大多放在了文科专业，原因就在于开设文科专业具有“投入少、速度快”的特点。1997年，我国本科层次的文科生与理科生之比为31.2:68.8，而至2021年，这一比例已达到51.9:48.1，这在客观上导致文科生源质量的相对下降。同时，高校对文科教育的各项措施却未相应跟上，文科毕业生总体质量不高也就成为不争的事实。

从学生的职业发展角度看，不少文科生自身期望值不高，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有学生在学习阶段只顾着玩，在提高思想道德、专业技术和身心心理等素养方面较少严肃认真对待，以致他们在就业竞争中拿不出像样的专业特长和优势，其就业岗位被理工科学生取代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用人单位对人才要求的角度看，目前用人单位对文科职业岗位质量标准的制定过于随意，导致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缺乏辨识度。如此一来，优秀文科生的职业才华在就业招聘或工作中难以被发现，这也是大多数文科职业壁垒低、可替代性大和工资不高的原因之一。

要走出文科生就业困境，急需全社会重新审视和确立文科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对文科教育的重视与否，体现了国人对精神世界和生活品质的追求程度，文科思维最终影响国家科技与文明的长远发展。当下国内文科生就业难的问题，正是文科教育被严重弱化的警示信号。

客观上，人工智能(AI)时代为文科教育发展带来了良机。AI时代不仅为文科生就业提供了更广阔空间，相关技术也为文科生的职业素养提升提供了便利。科技发展将带来社会劳动力结构和职业岗位的巨大变化，那些程序化的工作会被AI最先替代，但文科生适合的个性化工作被取代的风险反而更小。

同时，未来社会需要更多能应对复杂情境的文理结合型人才，而AI技术为文科生学习和掌握相关理工科专业技能提供了极大可能。202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美国生物化学家大卫·贝克的本科专业为哲学和社会科学，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文科生完全可学好理工科知识。

解决文科生就业难问题需要文科教育积极作为。其一，文科生的招生规模需要适度缩减。文科生就业难的重要原因在于人才专业的结构性失调，这是文科专业长期扩招的结果。国家对高校文科专业的升级调整已有周密部署，今后有社会需求的应用文科专业才会增设，文科教育转向内涵建设。

其二，文科生的自立自强教育需要加强。社会上有一种“文科生没有理科生聪明”的说法，这类说法于科学和现实均无依据，但不少文科生却借此给自己贴上弱者标签，放纵自身惰性。文科生需要精进专业核心技能和提升综合素养，这是他们增强就业竞争力的根本。

其三，文科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需要改进。文科课程教学的内容要与时俱进，把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放在首位，增加AI技术，加强科教融合、产教融合，着力培养学生解决复杂现实问题的专业才干。这些年，国家新文科建设通过“重点支持建设一批文科实验室，促进研究方法创新和学科交叉融合”，重视向文科学生成传授理工科技术，促使文科学生的专业实力增强、更具就业竞争力。

其四，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需要提升。要在理工科课程教学中融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注重理工科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培养学生健康心理、人文关怀意识、表达和沟通能力等，这些工作需要大量文科教师，从而扩大文科人才的就业面。

其五，文科拔尖创新人才需要花大力气培养。中国要增强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需要培养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家国情怀、专业本领的复合型人才。其中，能够在全球治理等问题上具有发现问题、界定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良好表达和沟通能力、跨文化理解力等全球胜任力的文科拔尖创新人才十分紧缺。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项课题“解决上海结构性就业矛盾的促进机制和政策创新研究”阶段成果)

高校英语教学模式应借鉴“超语”思维

■王平

在我国，英语课程几乎可以算是高校开设最普遍的课程之一。但长期以来，高校英语课程的教学方式却饱受争议。

比如，几乎所有高校的英语教学关注的都是学生一般语言知识(如词汇、语法等)的学习，以及语言技能(听、说、读、写)及文化素养的提升，主张通过营造沉浸式的课堂环境，帮助学生尽快达到如母语者一般的语言水平。

不过，这种方式秉持的是一种“单语至上”的语言观，排斥学生已掌握语言的介入，也忽视了学生资源库多语、多感官、多模态和多符号的存在价值。这种传统的语言教学范式很容易压制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利于他们实际交际能力的提升。

基于此，目前国内的英语课程教育可以尝试引入一些新的教学模式和理念，比如“超语教学”。

超语模式改变传统教学

作为近年来国际应用语言学界的新兴热点，超语(Translanguaging)概念于上世纪90年代首次被提出。当时其被用于描述威尔士语振兴教育中，学生交叉使用两种语言(英语和威尔士语)的课堂现象，后被引申为“通过使用两种语言创造意义、塑造经验、获得知识、理解并消化知识”。

目前，超语行为可以理解为“掌握多门语言的使用者发挥主观能动性，打破语言界限，在语言资源库中进行融合与自由切换，为实现有效沟通而构建新超语言系统的过程”。

换句话说，传统的语言学研究仅仅关注单一语言或某几种命名语言关系的研究，而超语则提出了更广阔的语言研究框架，即充分关注个体语言库资源在交际过程中呈现出的创造性、流动性和动态性等特征。

作为一种新型教育实践，超语教学在目前国际性的语言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实现超语教学尚需多方努力

目前，我国高校的超语教学主要出现在香港地区的英语媒介教学(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简称EMI)课堂。EMI教学是在英语非第一语言的国家和地区教授学术科目的一种方式，并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部分。

虽然EMI贯彻全英文课堂教学的理念，但许多研究发现，该课堂上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或多或少存在超语实践行为，并由此凸显出一定的超语化趋势。相较而言，大陆地区的超语教学研究较少，但结合近些年相关论文的发文量，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从关注超语的概念内涵，延伸到探讨如何将超语理论落地，并结合我国外语课堂特色，将超语“中国化”。

对于高校教师而言，从事超语教学需具备多语能力。课堂上多语资源的动态使用要求教师在不同语言之间灵活切换。当然，教师要想具备多语能力绝非一日之功，需要不断学习和掌握语言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

再比如，数学课上，老师要求学生选择不同问题并使用英语撰写建模报告。课堂研究表明，数学建模与语言学习的结合，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英语书面表达能力，还能加深其对数学知识的理解。

此外，超语还能为语言教学营造新环境。英语课上，教师让学生阅读科研论文、进行科学实验和讨论科学问题，同步习得英语和科学知识。教师用英语讲解辅以汉语字幕，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多种语言输入，还可以使学生的学习跨越语言界限。

总之，多语言学习环境的营造不仅有助于学生掌握多种语言，还能提升学生的认知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借助多语言优势，学生能更好地适应国际化的社会环境和职业需求。

在此过程中，超语还能大幅度促进语言教学创新。毕竟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教学方法与策略，以满足学生日益多样化的学习需求，这一过程也能反向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成长。

质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有关部门应根据当前的新时代背景对学生外语能力的要求，适时调整优化教育政策和资源配置，支撑超语教学实施。

作为一种新兴理论，目前我们对超语教学本身的研究也亟待优化。

首先，超语理论框架有待进一步完善。超语教学的理论基础包括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这些理论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构建更完善、系统的理论框架；也可以通过研究多语资源的动态使用对学习者语言能力和认知资源的影响机制，探讨在跨学科教学中，如何整合不同学科知识，才能更有利于目标语言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其次，超语教学的成效也需要大量实证研究做支撑。应设计并进行更多的调查和研究，以评估超语教学的有效性。

再次，教育政策和资源的优化是超语教学得以广泛应用的重要保障。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如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教育政策，以支持超语教学的发展。比如，研究如何通过教师培训和专业发展，提升教师在教学中运用超语实践策略的能力。

最后，超语研究应探讨如何利用技术手段(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虚拟现实等)提升超语教学效果。比如，通过大数据分析评估超语教学的效果，找出其优势和不足，还可以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营造沉浸式的学习环境，提升学生目标语言的学习体验。

总之，超语教学未来可期，但在理论框架的进一步完善、更深入的实证研究，以及教育政策和资源全面优化等多方面，仍有待深入探索。而多角度、多层次的学术研究，可为超语教学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导，促进其在语言教育领域更广泛的应用。

(作者系西交利物浦大学未来教育学院教授)